

辨國族身分

謝均才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隨着 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香港人」政治成員身分的變化這議題便變得重要而迫切；年前「愛國論」、新近「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的出台和公民教育的重新定向亦帶來連番爭議。本文討論和初步疏理有關國族身分或認同在概念上和倫理證成上的一些問題。綜合而言，就「認同國族身分乃道德原則」的證成，迄今支持個人要優先效忠國族的論據還是比較薄弱。雖然國族仍有一定的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特別是在其對個人的精神寄託和對整個社群的福祉上），但這些價值卻從屬於如公正等其他價值。況且，亦沒有證據證明要滿足某些需要便非國族不可。再者，在某些處境下，認同國族身分反過來可能害及個人、國族自身或其他社群。簡言之，僅有愛國心並不足夠，還須明智，才能愛得其值、愛得合宜。

關鍵詞：身分／認同；國家；民族；愛國心；國民教育

隨着 1997 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香港人」政治成員身分的變化這議題便變得重要而迫切；年前「愛國論」、新近「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的出台和公民教育的重新定向亦帶來連番爭議。雖然許多國家都以國民身分為公民教育的核心，藉以形塑其可欲的國民，可是「國家民族教育」（相關提法還包括「國民教育」、「國情教育」、「愛國教育」）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卻長期被忽視和排拒。回歸前後，香港人的身分成了熱門話題。香港社會和教育界就公民教育的取向和主次問題亦產生了激烈爭論，特別在國家民族教育和民主人權教育的方針上。公民教育中應否加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香港需要怎樣的國家民族教育？這些問題一直爭議不斷，亦令人關注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特區）政府會否推行和內地相似的一套中央化愛國主義文化和教育政策（梁恩榮、鄭鈺鈿，1998；Lee & Sweeting, 2001; Tse, 2007）。

事實上，香港在回歸中國後，公民教育日益強調認同國族或國民身分觀念。特區政府和愛國團體側重於加強學校的國家民族和愛國教育，培養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同、忠誠和自豪感，並能理解「一國兩制」政策和《基本法》。不過，香港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則擔心在公民教育中提倡國家民族教育，可能導致政治灌輸，因此在公民教育中更側重民主和人權觀念，以及批判思考。

回歸後香港人對祖國的歸屬感逐漸增強，特區學校亦大力推行認識祖國的公民教育，日漸向大陸靠攏。升國旗、唱國歌、慶祝國慶、兩地學生交流等活動逐漸普及化和常規化。2010年10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稱爲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提出設立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預計在2013–2014學年推行。及後，官方悄悄成立課程制訂小組，並在短短半年內迅速完成涵蓋小一至中六級的課程諮詢稿，建議所有小學和中學分別在2012–2013及2013–2014學年推行新科，結果惹來不少非議。但究竟香港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和其他公民教育元素的關係爲何等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就討論的焦點，多年來正反雙方各有所本（李正儀、田林竹，1998；梁恩榮，2011；黃嘉寶，1998；鄧啓麟，2011；Lee, 1999）。然而，若因爲主權回歸而加強香港的國民教育，這只屬政治原因而非政治理由。如果國民教育是答案，「問題」究竟在哪裏呢？

事實上，由上述爭議引發而來的很多答案，其實都是不清不楚、無關宏旨，甚至困窘叢生的，因爲它們只是想當然，繞過了很重要議題。例如：哪種國民身分（認同）或愛國心？哪個模樣的國民教育或愛國教育？這些複雜的理論問題都必須充分處理概念性、經驗性及規範性這三組問題，而它們又往往彼此交纏起來。概括地說，第一組是概念的釐清，涉及語義、語用的分析，當中牽涉到國族主義、愛國心、國家、民族、身分或認同等含糊曖昧但根本概念的辨析。第二組是事實問題，包括國族主義等相關社會政治情境及心理機制的實證分析。第三組是國族認同、國族主義、愛國心、教育理想的證成，涉及「甚麼是有價值的及可欲的？」及「爲甚麼？」。

以上三組都是複雜的問題，本文只能作初步整理，並聚焦在「國族認同乃倫理原則」的證成上。

釋義

分析國族認同或愛國的價值，當中的核心問題便是探討「甚麼是認同？」、「認同於甚麼？」、「爲甚麼要有認同？」、「甚麼值得愛或認同？」等原則性的思考。這涉及認同或愛的對象和手段，又要弄清楚國族社群的性質。究竟邦國、民族是甚麼東西？其分野在哪裏？彼此有何關係？要弄清問題，主要困難便是疏理和國族認同相關的諸多術語，可惜的是學界和公眾人士卻眾說紛紜；兼之不同定義又往往滲入不同價值觀和立場，人言人殊，益增溝通理解的困難。

先談英文 *identity* 一詞，漢語常譯作身分或認同。身分來自動態的「認同」（*identify with*），爲 *identification* 建構過程的對象，使身分確定或獲得與對象相同的性質（Elliott, 2011; Jenkins, 2008; Vignoles, Schwartz, & Luyckx, 2011）。「認同」本是心理學名詞，原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心理分析學派中人用以描述兒童在

人格發展過程中，由於感覺父母等成人的偉大，在不知不覺中持續仿效他們某些特質而成其本身人格的一部分。後來，艾力遜（Erik Erikson）發展出自我認同形成（ego identity formation）理論，認為一己的身分並非與生俱來，而須自身不斷經驗和探索才能達成。這任務對青少年尤為重要，它將深深影響他們日後對不同生活領域的投入。

身分是人格的一環，當中包括個人相對於他人的獨特性，對他人或群體的聯繫和連續感。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身分是個人和群體的中介或連接點，亦是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status）和角色（role）。自我（self）是一種反身覺察能力，亦是自我形象和自尊的基礎。身分又可分为個人（personal）和群屬（social）兩部分，而彼此又往往糾結起來。身分的內容和形塑植根於人際交往及生活經驗，以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尤其以符號、語言活動為媒介。此外，身分還是動態的個人生涯歷程。在「己不離群」的情境下，個人屬某集體一員，既有其客觀身分資格（objective membership）一面，亦有主觀身分意識（subjective sense of membership）一面，即個別成員對該集體的意識，其複雜的心理內涵包括認知、情感、動機、評價和行動等元素。常論及的便包括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自豪感（sense of pride）、優越感（sense of superiority）、忠誠（loyalty）和愛等。由於每個人都有多重身分，亦由此帶出多重角色。這些地位叢（status set）和角色叢（role set）具有個人性、群性和文化性。身分叢的對象包括眾多類別、集體和個人，在這連續體上可以由抽象到具體。

身分認同引伸至國家、民族這些集體對象而論，國家、民族等詞都是充滿歧義的概念。現代漢語中「國家」一詞涵蓋了土地、山河、民族、人民、政權、政黨、領袖、主義等的意義，結果每易造成思維混淆（方維規，2002；江宜樺，1998；南雁鳴，2004；戴耀廷，2007）。用英語來說明，國家可同時代表 country（地理意義上的國土、山河）、nation（族群意義上的民族或全體國民）與 state（權力意義上的邦國、政體或政權，也就是對特定地域及其中居住的人民壟斷及行使最高權力的管治組織，見 J. A. Hall, 2003）。這幾重意義，有時且可以交替使用。如果不清楚它們之間的分別，就粗疏地只用「國家」一詞來指涉這多面向的對象，就可能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局面，彼此所談的根本就不是同樣的東西！

簡單來說，現代國族（modern nation）不單是文化上、擬血緣上的民族，亦是疆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邦國。它同時意指結合單一文化族群和統一政體，一方面可指涉在該政體下生活的一群人，即一個社群（community，漢語一般譯為民族）；另一方面又可指涉治權獨立的政體（polity，漢語通常譯為國家）。而這兩者又互為表裏，故可籠統地譯為國族，以涵蓋這兼具文化性和政治性的複合體的雙重意義。

個人屬某國族一員，既有其客觀國籍（nationality），亦有與其相對應的主觀身分意識。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一語用於國族，其所表達的涵義是國族成員對自己國族認知的歸屬及感情寄託，又習稱為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愛國心或

愛國精神 (patriotism) (Smith, 1991)。此外，英文 nationalism 一詞又是另一複義詞，可按不同意義翻譯。跟本文討論直接相關的，其一是民族意識、愛國感情或認同的心理狀態，在此心理意義下可視為愛國心及國族身分認同的同義詞；其二是一種道德規範或美德，即要求個體成員對國族效忠、承擔、奉獻和犧牲，且甚至是最高和無條件的。¹

儘管如此，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ism 及 patriotism 三者的語用和語義卻無法固定下來；相關的漢語翻譯更形複雜，也帶來更多歧義（朱法源，1988）。尤其是 nationalism（漢語可譯為國族主義、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及 patriotism（漢語常作愛國心、愛國精神或愛國主義），就由於價值觀不同和對愛國的定義有別，遂得出毀譽不一、截然兩極的立場，因而引申出好的與壞的、真的與假的國族主義或愛國心的辨別與相互攻擊。² 當然在國族主義或愛國心前，還可以加上眾多不同的詞綴（Brubaker, 2004; Vincent, 2001）。為此，本文的討論選用意義較中性和寬廣的「國族認同」或「國族身分」一詞，因為國族可指涉多層面，而認同亦較愛更周全，愛可視為認同的其中一種心理狀態。

為何要認同國族？國族認同的證成

近年，就愛國心和國族主義的道德基礎有不少討論（J. Cohen, 1996; Gans, 2003; McKim & McMahan, 1997; Miscevic, 2000; Moore, 2001a, 2001b; Primoratz, 2002; Tamir, 1993）。長期以來，有關國族認同的證成可說是理與情之爭持史，近年則有把情感帶回政治哲學的討論上。辯護士為國族主義（包含愛國心）說項，亦因此再次掀起愛國心是美德抑罪惡、國族及其身分有何價值的爭論。

以往，主流西方政治哲學對國族主義普遍是戒慎恐懼。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均反對國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可以理解的。前者以個體自由為重，反對國族的集體主義色彩，不大考慮「我群」（we group）因素，而其內蘊的普遍傾向比較能證成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的理念，拋卻一般人關切的國族認同立場，使它很難成為特定國族建構認同的適當基礎。³ 後者以階級認同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為先，貶抑國族認同和地域主義；而國族主義和政治帶來的戰爭和種族屠殺更是駭人，使國族主義常常背負惡名。

鑑於「國族」和「認同」的複雜迷濛特性，掌握其多面向性便顯得十分重要，這樣才能把握認同的對象及其性質。如上文所述，所謂國族乃泛指領土、人民、邦國這三大部分；而當中人民又包含民族，以及歷史、傳統、文化等元素。國族主義者對國族或國族體（nationhood）推崇備至。把國族主義看作道德原則，就是強調整個國族凌駕於其他眾多集體身分，凌駕於個人。易言之，國族主義不單要求個體效忠，更

要求國族高於其他集體（即得到優先效忠）。如此說來，道德意義下的國族認同即是要求個人偏袒自己國族（*partiality*）的特殊義務。

國族的價值又可分為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兩類：前者鼓吹國族的自足目的；後者則是藉國族帶來（預期）好處來立論（Bell, 2009; Miscevic, 2010; Özkirimli, 2005），又分為四方面，茲分述如下。

公益說

公益說（*public good argument*）視國族身分為集體身分和共享目的，是達成民主公正等政治目標的必要條件。此說主張國族身分的正面價值及積極貢獻，並期望以此消弭政治冷漠、社會的原子化和個體不負責任感等症候。例如共和論（*republicanism*）宣揚的「積極參與」、「榮辱與共」、「兄弟般情誼」或社群論（*communitarianism*）倡導的公益觀。這種「公共精神」是民主生活的必要條件。堅強的國族身分或高度的愛國心和忠誠，甚至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眾志成城就創造互信或社會資本，對穩定民主有所裨益。

此外，休戚與共的同胞精神也能奠定社群團結的基礎條件。公益說最重要的論證是一定程度的社群（亦作共同體）意識或「國人」（即使素未謀面、互不相識）彼此關顧的感情，對政體存在、政治參與、延存公共文化、維護公正及福利的貢獻。這種成員意識（*sense of membership*）及「共同一體感」（*sense of community or unity*）是必要和可欲的。這主要是從對社群效益的角度去證成。就此意義來說，它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C. Cohen, 1971）。例如，Miller（1995）視它為群體的凝合劑，「國人感」易形成民意。在「共同一體感」下，這種共同連繫能促進公正。Callan（2006）亦利用 John Rawls 的學說來證成愛國心；把愛國心視作道德情操，有助支持制度的公正和秩序。

公益說有理之處在於點出國族成員相互依存、榮辱與共的一面。民主、公正和福利的運作亦一定程度端賴固定社群的存在，以及成員對社群的承擔和貢獻。但手足之誼（*brotherhood*）或博愛之情（*fraternity*）卻取決於其他條件的配合。況且，見諸歷史經驗，國族既能促進公益，亦能損害公益，以國族主義之名的侵略戰爭便充分說明其負面影響。

保障或解放說

人們無法離開土地生活。愛護國土河山，主要是因為它是資源和國民生計之本。生於斯、長於斯而萌生鄉土之情亦屬普遍情懷。管治組織要以保障或促進集體安全、秩序和福祉為依歸。從保障集體的角度來看，提高國族認同亦是捍衛本國、抵抗外來

侵略的政治動員手段。同樣，視國族主義為政治自決原則，用於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抗爭，是解放的手段，可以帶來獨立自主。這些都可視為「防衛式國族主義」(defensive nationalism)：面對不義的壓迫及緊急狀態，內部團結，一致對外，犧牲個體利益來遷就和成全國族。這亦是合理，但卻不是無條件的。誠然，外敵侵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均為不義，但反對壓迫的理由可以是訴諸人權、平等、自由、公正等更普世的原則，而不必訴諸「我群（被殖民者）起來鬥爭他群（殖民者）」的邏輯。另一個問題是，掙得對外自主後的國族亦有可能蛻變為壓迫者，對內實行苛政，對外施加侵略。至於邦國，它是一地域內獨享強制力的政治機制，我們更要追問其管轄的正當性或權威的由來。現代主權 (sovereignty) 理論強調這種絕對且最後的權力須來自人民。自由主義便推崇憲政民主制度為認同的基礎 (江宜樺, 1998)。憲政主義 (constitutionalism) 是一種政治自由主義。立憲政府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是一種政府體系，各機關及其政治過程均在憲法規則的有效約束下運作。它既限制了政府權力，同時亦保障了人民的個人自由和基本權利。

身分構成及昌榮說

以上兩說都主要從集體的角度來證成國族認同，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解釋為何個別成員要有強烈的國族身分認同，甚至肯為之犧牲自我，亦沒有進一步分析個體如何實踐其愛國心。另一個常見的論證是國族身分為個人身分的重要構成部分，賦予個體共同感或延續感 (sense of identity, commonality or continuity) 以及成就自我、生命意義的功能。國族把個人和社群連結起來，把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結起來，能繼往開來，繼承、延續國族的文化傳統。對個人而言，國族有定向作用 (fastening/sense of location)，猶如賦予人生旅途的錨。人亦需要自我界定，而用以界定的對象之一便是國族；國族能為個體提供歸屬感、自豪感、成就感，從而肯定個人的存在價值。愛國心或民族意識是一種群性連結或紐帶 (bondage)，亦是很多人的深層心理需要，故在現代社會的情境下歷久不衰。以父母姿態出現的國族意象，對個體提供「共同、共有、共享」的感覺，能滿足連結、安全、滋養、保護和關懷的需要，產生紐帶、連繫 (attachment) 或親和 (affiliation) 的力量。⁴

這一說點出國族於個人心理需要的重要性，雖然有相當道理，但這種心理機制因人而異，有些人感覺強烈，另一些人卻不需要。對個人而言，需要的程度亦可能時有漲退。況且，國族只是個人置身其間的諸社群之一，而非惟一單位。雖然有人能從國族得到滿足，但亦有人可以從其他社群或渠道得到。事實上，國族只是現代產物。長久以來，很多人都從國族以外的社群得到滿足。可見個人並非無國族依託不可。按此，這一說即使能證成個人需要社群和需要國族認同，或國族對部分個人的正面作用，仍不足以證成國族為首要群體。例如優先的為甚麼不是家庭？不是部落？不是本鄉？

不是全人類？尤其在當今社會，國族這一層次的社群正受到更上一層次（如區域或世界）或更下一層次（如族群、地域）的夾擊，致使傳統的以國族為核心的公民資質觀要面對諸如世界公民觀（the notion of world citizen）、寰宇一家觀或世界大同主張（cosmopolitanism）和多元文化觀（multiculturalism）等的挑戰（Lichtenberg, 1999; Linklater, 1999; Tan, 2004）。

況且，除正面作用外，國族對個人亦可能有不少負面影響，例如過分依戀、極度崇拜、權威人格和自毀等惡果（Bader, 2006; Langman, 2006; Scheibe, 1995）。就國族認同的負面意義來說，他己的分野常為妄自尊大的我族中心意識（ethnocentrism），相伴隨的是種族偏見和歧視。更甚者易變成敵我對立，排斥和妖魔化外人。弔詭的是，國族間的競爭、衝突和戰爭常滋生國族意識，而國族意識又帶來進一步的衝突或戰爭。

文化脈絡說

與身分構成及昌榮說相關的是整個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對個人的重要性，它能滋養個人成長，豐富個人選擇。這亦是社群論的主要論據。由於我們出生時便只能處於一既存的文化脈絡，國族文化或多或少會有親近性（proximity）或親和性（affinity）之便。這是一種先存的優先性（priority）。民族屬族裔及文化式社群，至少對個人在原初狀態具有非自願、不可選擇的影響。個人只能是社群的成員。就此意義來說，是社群決定了我（們）是誰。這種共同性最常見於語言習俗，其他如傳統、信仰、價值、規範亦是很重要的文化資源。

此說亦有部分道理。文化這種資源固然能有益於個人，但它亦可制約或戕害個人。而且，文化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a package of way of life），包羅萬有、良莠不齊。再者，認定甚麼是國族文化亦非易事。舉例來說，甚麼是「中華文化」？誰說這便就是中華文化？以誰的依歸來判定這才是中華文化呢？這些都是極具爭議的課題。況且，國族文化的內涵未見得全是正面，文化的優劣仍待進一步辨清。如果連文化的複雜性（包括其獨特性、純正性、開放性、內部差異、精華與糟粕、權力運作等）都說不清楚，其優劣和對個人的裨益禍害亦無從確定。故此，我們反而要先弄清該國族文化的內容、起源、運作和實質影響。不然的話，持守固有文化往往只會故步自封、因循守舊，未能與時俱進。

此外，我們可以承認社群為個人提供資源，但卻不代表由此便應否決個人的選擇權（也許學習母語是個例外）。

內在價值論

最後，除以上四項工具價值外，就國族的內在價值，最常提及的便是社群（community）和文化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

社群論反對過度個人主義式的自我觀，批駁這種自足的原子式個人觀。若社群是可欲的，而社群又依賴個人，則個人有責任去維繫或創造好社群。又若這種對社群的關愛能使社群變得更好，則它是值得支持的。由此社群論能證成國族是社群的價值和對社群的重要性（無論是工具性、情感性或構成意義性）。但即使我們接受人是群體動物、個人須嵌入社群的觀點，卻無法證成國族較其他社群重要而具有凌駕性（因個人不止生活在單一社群）。此外，社群的好壞亦是另一個有待判定的問題。社群論以為社群就是好，然而我們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社群中，現實生活中亦不見得每個社群都是美好的。由此，我們反過來要檢視社群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只有好的社群才是好！也只有好的社群才值得維護和保守！

另一論點是，國族本來就是文化殊異的社群，是一套獨特的文化。推崇國族，就是一種捍衛文化多元性表現的主張，它能夠為個體提供更多選擇，而且多元文化在世界並存亦是可欲的。

文化多元及其保存是一件好事較少爭議，但文化多元是否只能靠國族來維持則受到非難。承上文所言，當今世界的文化複雜性非數百年前可比，即使一國族之內亦存在多元的文化，而文化交流亦不限於國族之間。事實告訴我們，營造和維持國族文化往往是以犧牲或剷平少數民族文化而來的。同時，崇尚國族文化的保存亦易流於將文化同質化、本質化和靜態化的偏蔽。這就是抹煞文化內部的多元性及多源性，以及文化的流變狀態。再者，文化除要保存外，尚有發揚、創新、批判、交流的部分。不應只是為保存文化而保存文化，更根本的還是該文化有優越性（superiority）才值得保留發揚，而這種優越性卻不是先驗判定的。只抱持「文化守成論」（cultural conservatism）並不足取。

要如何認同國族？認同的情與理

上一節主要撮述有關國族價值的主要論證。我們必須正視國族認同亦正亦邪、可善可惡的兩面性。當然，有價值的東西便應維護和認同，但「如何認同」亦同樣重要。Callan（2006）便嘗試分辨「甚麼值得愛」（愛的理由）以及「怎樣才謂之愛得其法」（愛的行徑）等的幾個議題，辨明愛國心在哪種條件下才是美德。顯然，即使「值得愛」（為何愛）並不等於可證成「愛得合宜」（如何愛）。雖然我們可以有條件地證成個人的愛國心，肯定這股激情或深情的力量可以成爲一種動機、期待、承擔甚至不死心，但考慮愛國之行時便更複雜。因爲即使肯定了愛國心，仍然有「善愛」和「錯愛」之分。Callan 便把愛國心分爲道德上恰當（morally apt）和偶像崇拜式（idolatry）兩種，兩者最顯著的差別是對愛的對象（國族）及愛國行事的認知。道德上恰當的愛國心講求的不單是愛，更是「明智的愛」。這種明智的愛不單尊重事實，

亦體察其他比愛國更高的道德價值或原則。這意味着這種愛國心不應是狹隘盲目、非理性、妄自尊大 (chauvinistic)、仇外 (xenophobia)、排外以至侵外 (jingoistic) 的。

這方面的討論使我們必須再次聚焦於個人認同國族的心理狀態。就認同 (identification) 的心理過程和機制而言，受現實條件影響，這心靈活動兼具感情依附和歸屬以及理性的現實利益考量。它涉及群際分野和個人歸類 (包括看待其同群、成員及他人)。如是觀之，認同和差異實是一體之兩面，互相蘊含。認同又隨削平群內差異的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及強化群際差異的異質化 (heterogenization) 互相作用。群際交往又往往作出比較和評價，並易由此萌生定型和偏見 (Tajfel, 1981)。

認同過程和機制是個人和社群的雙程互動，當中既有個體能動性 (agency) 的一面，亦有結構條件約制的一面。正如上述，社群身分就是角色，即社群對個人言行的文化規範。對個人來說，雖然社群設定角色，但個人仍有相當自主性去演譯和磋商角色，而非只有接受 (Woodward, 2002, 2004)。個人身分認同有其複雜的外在和內在因素、個體和集體的作用。強求認同反而不妙。

近年來，呼應後現代思潮的學術上轉向，對認同的理解和研究亦有相當轉變。簡言之，就是從過往所謂「強認同」 (strong identity) 到晚近「柔認同」 (soft identity) 的進路 (S. Hall, 1990, 1991, 1996)。前者強調單一、既有及延續的身分存在 (being)；後者則強調多元、流動、混雜、動態的生成 (becoming)。前者求同，後者重異，可謂南轅北轍。

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在「強認同」和「柔認同」中二擇其一。反之，上述討論更加豐富了我們對身分的能動性、複雜性、多元性和歷史性的認識。

再者，認同過程其實是一種文化政治。後現代思潮詬難現代的認同觀，認為群屬身分本身是建構性的，而不是甚麼中立的、客觀的或自然的，它是一種權力的操作。新社會運動便是後現代政治的表徵之一。在後殖民論述下，或從國家內部殖民這一角度來看，國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它被政體經營用以壓抑人民，因此必會成為社會運動抗爭的具體對象。我們必須釐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力關係，即哪種人的文化？誰的歷史？甚麼聲音？誰可以代表人民？這樣其實是要重新思考政治本身，而不是無條件支持或默許建制 (孟樊, 2001)。

事實上，國族認同極易受政治操控，可帶來絕不寬容、排除異己 (無論是內奸或外敵) 等惡果。另外是愛國心的誤置問題：以提升愛國心來解決不當的問題或無視問題的根源，可能治標而不治本 (例如制度層面的成因)；而解決社群認同這心理需要其實有多個方法，一些是善法，另一些卻是飲鴆止渴。片面鼓動愛國心救不了制度的腐朽和統治者的衰敗。

由此可見，國族認同中的情和理、心和行，以及塑造身分過程當中複雜的政治和文化霸權因素，還須進一步辨別。

餘 論

本文藉香港的爭議，帶出有關國族認同在概念上和倫理證成上的一些重大議題。要充分處理國族認同或愛國心這心理、政治和道德課題，既須釐清概念，亦要作實證分析和規範討論，當中涉及複雜的國族和認同理論，但惟有這樣才可以證成國族身分的價值。本文檢視眾多認同國族（愛國）的主張和論點，指出當中有些可取，有些不可取，有些局部可取。綜合而言，國族身分認同的正面價值是承擔精神或責任感，它能促進個人積極參與政治生活、集體決策以強化管治和國家功能，有利民主政治；同時，社群成員的廣泛參與亦有助防止專制濫權。此外，國族認同亦能體現出集體的權利，例如發展並共享資源。而面對他群的不公、侵害或壓迫，己群自有其反抗之理，集體亦以此為個人提供保障。

雖然國族認同能找到共和論和社群論的一些論證作支持，但卻受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論，以及實徵證據的質疑而必須作出修正。反對的論據多訴諸人權、公正和個體自主等來否定國族的凌駕性或優越性。⁵ 綜合而言，就「國族認同乃道德原則」的證成，迄今支持個人要無條件對國族作優先效忠的論據還是比較薄弱。雖然國族仍有一定的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特別是在個人精神寄託和社群福祉上，但這些價值卻從屬其他如公正等的價值。而且，亦沒有證據證明要滿足某些需要便非國族不可。再者，在一些處境下，不恰當的國族認同，例如對認同對象混淆不清、過度狂熱、惟一或排他式的認同，反過來可以損害個人、其他社群以及國族自身。

簡言之，僅有愛國心是不足夠的，還須明智，才能愛得其值、愛得合宜。單說愛國這種特殊義務或道德責任的內涵其實並不清楚，亦不足夠。儘管我們可以承認群性連繫的重要性，但甚麼性質的群性連繫正正需要檢視，在有需要時加以修正。如果愛國心純粹是一種感情，則如何適時適切地激發這心，更是一種實踐智慧。

當然，有關國族認同的討論，迄今仍如火如荼地進行，本文僅作初步疏理。文中帶出的問題，恐怕比筆者所能解答的還要多。最後，另一些本文未及討論的問題是和國族認同有關的教學啟示，特別是公民教育、國民教育、愛國教育的定義和定位（Archard, 1999; Hand, 2011）。希望日後有機會再進一步申明。

註 釋

1. Nationalism 尙有其他語義，如文藝上的民族風格，以及「由族及國」（from nation to state）或「同族立國」的政治期盼、主張和運動，即某個民族追求政治自決，甚至成為獨立邦國，享有主權的政治實體。易言之，指某文化社群追求享有對內和對外的最高政治權威。詳見 Smith（2001），這裏從略。本文聚焦於「國族認同乃道德規範」的證成，亦因此兼及個人認同國族的心理狀態，但不擬處理政治自決主張和運動部分。

2. 如 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 Sanford (1950) 所言的虛假愛國心 (pseudo patriotism) 與真摯愛國心 (genuine patriotism) ; Schatz, Staub, & Lavine (1999) 所言的盲目愛國心 (blind patriotism) 與建設的愛國心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 Merry (2009) 所言的忠誠的愛國心 (loyal patriotism) 與批判的愛國心 (critical patriotism) 都是例子。Viroli (1995) 認為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感或理念和公眾意識，其對象亦是兩樣，即先祖、父輩的土地 (patria) 與 nation 的區別。愛國是對共和國，亦即對某種特定的、以保障全體公民平等與自由權限為本位的政治體制乃至生活方式的熱愛之情。愛國情感是以同情慈悲、尊重所有自由和平等的個體為前提，以共和制保障本國公民生存利益和自由幸福為條件。它反對專制主義、獨裁者、壓迫和腐敗。公民享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主人地位和精神，活得充滿尊嚴和幸福。對共和的愛是比較理性開放和寬容的。反之，民族感情則以相同文化、語言和種族為效忠基礎。它是無條件的，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態看作次要。民族主義具非理性獻身精神與狂熱激情，且強調忠誠，即以犧牲個體自由權利與個性發展為代價；亦較富一元性和獨斷性，狹隘封閉、排他專橫，並有發展至侵略和奴役他人的極端傾向。
3. 自由主義將公民身分 (citizenship) 看成一種法定地位 (legal status) 和具有相當權利的資格 (entitlement)，國家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乃是基於保障個人權益的工具性或功利性考量。除少數消極義務外，公民毋須負擔參與公共事務等積極義務。
4. 認同群屬身分 (social identity) 背後有不同動機，包括提升自尊、降低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平衡滿足歸屬感和保存個性兩種需要間的矛盾，以及找尋生存的意義、紓解對死亡的恐懼 (詳見趙志裕、溫靜、譚儉邦，2005)。
5. 至於「國民」和「世界公民」理念兩者的關係與分際，囿於篇幅，這裏無法細述。然而，我們毋須作「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猶如個人擁有多重身分卻可以並行不悖。我們人類或許可以在符合基本人權的情況下接受對不同社群有等差的愛，更具體的論析可見 Smith (2001)、Tan (2004)、Appiah (2005) 及 Parekh (2008)。

參考文獻

- 方維規 (2002)。〈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總第 70 期，頁 33-43。擷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070_0107022.pdf
- 朱宏源 (1988)。〈從民族到國家：論 Nation 意義的蛻變〉。《中山社會科學譯粹》，第 3 卷第 1 期，頁 118-132。
- 江宜樺 (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台灣：揚智。
- 李正儀、田林竹 (編) (1998)。《從理論到實踐：大陸、香港、台灣公民教育政策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孟樊 (2001)。《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台灣：揚智。
- 南雁鳴 (2004)。《「國家」係乜？》。香港，中國：進一步多媒體。
- 梁恩榮 (2011)。《轉化公民：面向一國兩制的公民教育》。香港，中國：圓桌精英。

- 梁恩榮、鄭鈺鈿（編）（1998）。《民族教育的路向：研究與反思》。香港，中國：關注公民教育聯席。
- 黃嘉寶（1998）。〈意識形態爭論下的九七香港公民教育走向〉。載李正儀、田林竹（編），《從理論到實踐：大陸、香港、台灣公民教育政策研討會論文集》（頁 109–133）。香港，中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趙志裕、溫靜、譚儉邦（2005）。〈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社會學研究》，第 5 期（總第 119 期），頁 202–227。
- 鄧啓麟（編）（2011）。《你所不知道的國民教育：政治不正確教師及學生用書》。香港，中國：圓桌精英。
- 戴耀廷（2007，11 月 14 日）。〈「國」的四個維度〉。《信報》，頁 16。
- Adorno, T. W., Frenkel-Brunswik, E., Levinson, D. J., & Sanford, R. N.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Appiah, K. A. (2005). *The ethics of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chard, D. (1999). Should we teach patriot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18(3), 157–173. doi: 10.1023/A:1005138406380
- Bader, M. J. (2006). The psychology of patriotism. *Phi Delta Kappan*, 87(8), 582–584.
- Bell, D. (2009). Communitarianism. In E. N. Zalta (Ed.),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munitarianism/>
- Brubaker, R. (2004).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Reflections on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Citizenship Studies*, 8(2), 115–127. doi: 10.1080/1362102042000214705
- Callan, E. (2006). Love, idolatry, and patriotism.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2(4), 525–546.
- Cohen, C. (1971). *Democracy*.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Cohen, J. (Ed.). (1996).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Elliott, A. (2011). *Routledge handbook of identity studies*. Abing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ans, C. (2003).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 A. (2003). State. In W. Outhwaite (Ed.),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2nd ed., pp. 661–663). Malden, MA: Blackwell.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England: Lawrence & Wishart.
- Hall, S. (1991).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A.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pp. 31–68). Basingstoke, England: Macmillan.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 London, England: Sage.
- Hand, M. (2011). Should we promote patriotism in schools? *Political Studies*, 59(2), 328–347. doi: 10.1111/j.1467-9248.2010.00855.x

- Jenkins, R. (2008). *Social identity* (3rd ed.).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angman, L. (200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nationalism: To die for the sake of strangers. In G. Delanty & K. Kumar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p. 66–83). London, England; Thousands Oak, CA: Sage.
- Lee, W. O. (1999). Controversies of civic education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J. Torney-Purta, J. Schwille, & J.-A. Amadeo (Eds.), *Civic education across countries: Twenty-four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project* (pp. 313–340).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 Lee, W. O., & Sweeting, A. (2001). Controversies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transition: Nationalism versus liberalism. In M. Bray & W. O. Lee (Eds.),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mes and experiences in East Asia* (2nd ed., pp. 101–121). Hong Kong,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chtenberg, J. (1999). How liberal can nationalism be? In R. Beiner (Ed.), *Theorizing nationalism* (pp. 167–188).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inklater, A. (1999).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In K. Hutchings & R. Dannreuther (Eds.),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pp. 35–60).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McKim, R., & McMahan, J. (Eds.). (1997).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ry, M. S. (2009). Patriotism, history and the legitimate aims of American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1(4), 378–398. doi: 10.1111/j.1469-5812.2007.00363.x
- Miller, D. (1995). *On nationality*. New York, NY: Clarendon Press.
- Miscevic, N. (Ed.). (2000).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Chicago, IL: Open Court.
- Miscevic, N. (2010). Nationalism. In E. N. Zalta (Ed.),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ationalism/>
- Moore, M. (2001a). *The ethics of nationalism*.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M. (2001b). Normative justifications for liberal nationalism: Justice, democra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7(1), 1–20. doi: 10.1111/1469-8219.00001
- Özkirimli, U. (2005).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gagement*.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Parekh, B. (2008). *A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Basingstoke, England;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Primoratz, I. (Ed.). (2002). *Patriot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 Schatz, R. T., Staub, E., & Lavine, H. (1999).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 151–174. doi: 10.1111/0162-895X.00140
- Scheibe, K. E. (1995). *Self studies: The psychology of self and identity*. Westport, CT: Praeger.
- Smith, A.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Penguin.

- Smith, A. D. (2001). *Nationalis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mir, Y.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n, K.-C. (2004). *Justice without borders: Cosmopolitanism,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e, K. C. (2007). Remaking Chinese identity: Hegemonic struggles over national edu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3), 231–248. doi: 10.1080/09620210701543908
- Vignoles, V. L., Schwartz, S. J., & Luyckx, K. (2011). Introduction: Toward an integrative view of identity. In S. J. Schwartz, K. Luyckx, & V. L. Vignoles (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27). New York, NY: Springer.
- Vincent, A. (2001). Political theory. In A. J. Motyl (Ed.),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Vol. 1, pp. 589–610).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Viroli, M. (1995). *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ward, K. (2002). *Understanding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Arnold.
- Woodward, K. (2004). Questions of identity. In K. Woodward (Ed.), *Questioning identity: Gender, class, ethnicity* (2nd ed., pp. 5–41). New York, NY: Routledge.

On National Identity

Kwan-Choi TSE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roversies over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uring a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me major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with patriotism also included). The debates at stake are discussed in light of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normative justification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is conducted on two groups of key concepts: n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usag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five major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re discussed one by on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some arguments for national identity are supported, albeit with certain modifications.

Keywords: identity; state; nation; patriotism; national education